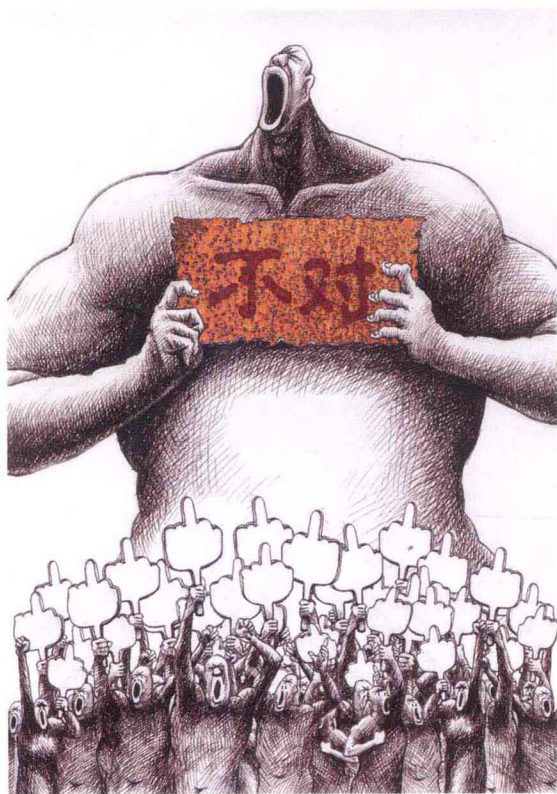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对

李公明 著



说“不对”看起来是一种否定，但是，对“不对”的否定不正是对“对”的肯定吗？当我们说“不对”的时候，心中不正是怀有关于“对”的价值观和理想吗？……这些都是关于“不对”的最简单的常识。可惜的是，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要为说出常识、实践常识而奋斗的时代。在这时代，做一个“不对”先生，是尽公民的责任。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不对

李公明 ◎ 著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对 / 李公明著. — 广州 : 南方日报出版社, 2013. 7
ISBN 978-7-5491-0796-4

I. ①不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5955 号

BUDUI
不对

李公明 著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: (020) 8300050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投稿热线: (020) 83000503 读者热线: (020) 83000502

网址: <http://www.nfdailypress.com/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序言 不忍而已

梁文道

去年，一位任教北京某大学的老同学在香港出版了他的评论集子，与原来的内地版本相较，自有少许不同。于是他很高兴又很无奈地为香港版本撰写新序，喜于有些话终于可以摊开来讲了，无奈他心目中的原始读者到底不易看见自己的坦荡。这种困境，我们一点都不陌生，光是20世纪，这世上就有数不清的作者遇过同样的问题。是要沉默，还是要毫无顾忌地冒险发言呢？终于就发展出一套顾左右而言他，把意思埋藏在字里行间的“隐密写作”，久而久之甚至成了一门学问。写的人要有技巧，看的人也要懂门道，大家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。

公明大哥（我一向如此称呼李先生）这部新集，艺评和书评占去其中四成，另外六成则是正面直接的时论，很能反映他多样的写作状况，更能表明他的功底能耐。然而，表面上看，这样的组合又实在古怪，似乎硬把扯不上关系的东西搅在了一块；明明该是几本书的内容，偏生凑成一册。不过，只要略微翻阅，便能发现那些关于宪法学论著的书介，以及几帧柏林奥运的图像分析，其实都是意有所指，与书里头谈时事的文章呼应出同一种怀抱。这类藉着书评艺评指点江山的事，我也干过不少。有时候朋友们开玩笑，自嘲大伙练的是《葵花宝典》。然而，首先自宫之后，神功却未必大成。大家苦修“隐密写作”多年，又曾修出什么正果？

昔日的时事评论人，今号“公知”；而“公知”没多久就成了一个贬义词，贬值之速，犹如“人民”等其他新中国常用语。有人讨厌“公知”，是为了意识形态的不同，说他们是汉奸，是“带路党”，妄图以西化中。有人讨厌他们则是为了他们的姿态不好，老是一副什么都懂的模样，这个也评，那个也议，好像任何领域都少不了他们的份。我们还可以用今日最流行的视角抨击他们，说他们是为了抢眼球，霸占“话语权”。说了什么不要紧，说得有没有道理也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时常公开发言。公开发言，而听众不少，那就叫做“炒作”了。

写得辛苦（或曰“技巧”），写完了还要遭受上头和下头的双重不满。这又何苦？

关于政论，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批评大概就是“空谈”二字。无论写了多少，人家一句“光说有什么用”，就能把一切都顶了回去，就能取消你所有的苦思和努力。的确，光说是没什么用的，特别是在中国。公明大哥集子里有篇文章谈到近年各种“公共话题”的兴衰，“黑砖奴”也好，“拆迁钉子户”也好，甚至大到像温州动车事件那样的事故，几乎无一不是烂尾收场。事情一出，大家义愤填膺。骂完一通之后便悄无声息，仿佛一切不曾发生。

但我又想到了一句老话：“莫道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掷处血斑斑”。小时候我看这句话只算知其字义，直到开始在大陆写作，这才有了点体会。原来这个世界竟有这样一种衡量写作意义的标准，不是看你写的东西影响了什么、改变了什么，而是看你这个作者得到了什么后果；如此具体，如此切身。当然今天因言杀头的事是没有了，但余此之外呢？前阵子另一个写评论的朋友来港演讲，他笑着说在观众席上看到几个“熟悉的面孔”，惜他们一路辛苦跟到了香港，台下会意者当堂大笑。笑声背后便是这书生的后果，这类后果从稿子被审查被删改开始，到专栏被停，到媒体封杀，到人格抹黑，一路去到想象力的边境。

困顿疲乏之际，不妨聊以自慰，把这些后果当成“自己一定做对了什么”的证明；如果只是空谈，如果没有意义，人家又害怕些什么呢？要用这种方式来体会写作的意义，是我以前只在香港发表东西时所想象不到的。写作果然还是得看“背景”，看你在什么地方写，看你给什么地方的人看。

“如果说管理部门‘睬你都傻’反映出权力的傲慢，那么‘打死不响应’就只能说明权力的心虚和恐慌。但是，为什么傲慢与心虚的结果总是公共话题的‘烂尾’？为什么公权力敢于‘睬你都傻’？道理太简单了：我就是不理你，你能怎么样？公众的无奈和挫败感也正是因为这样：你能把他怎么样呢？这无非说明，如果人民手中没有握着真正的选票，权力必然是不受约束的”。这是我在这本集子里头随手摘出来的一段话。再翻几页，又看到一篇抨击广州市拆迁一段百年老骑楼街的文章，他说：“在恩宁路事件中，我们看到的是有关方面当面说好话，背后搞阴谋，完完全全表现出没有诚信、没有廉耻，没有政治文明的最基本道德的嘴脸”。这全是公明大哥平常在广州报刊上发表的文字，难怪当年许多外地人来到广东都得经历一段适应期。他们初来到埗，翻开报纸一看，便会惊讶地说不出话，忍不住要问本地帮：“你们平常看的東西都是这个样子吗”？

或许这就是我们南蛮广东的开明。当年第一回和公明大哥联络，不知就里地先用普通话问候。他就豪爽地在电话里笑道：“喂，我地讲白话就得啦！”自此便别有一番同声同气的亲切，也更能明白他那多隐密的写作也隐不去的直率。再看省城广州，这几年的公民行动简直是风起云涌，就像公明大哥在书里所说的，从单枪匹马抗议政府形象工程的少年，到一个关注本土文化保育的组织，尽见草根市民的觉醒。第一个在家里做好标语拿去路边示威的人或许还要莫大的勇气，但当第二个、第三个也开始前仆后继地站出来之后，冒险便成习惯，甚至对当局而言也都是个习惯了。尽管前路漫漫，可这第一步到底是踏出去了。

不，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启蒙的功劳，写评论的人没有这么了不起（甚至包括公明大哥在内）。有时候写作并不是为了什么可见可计算的目标，就像那些监督滥用政府汽车，反对无理扩建地铁，独立报选人大代表的普通广州市民一样，公明大哥只不过是用了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工具来行动而已；不知行动后果，不计行动代价，他只是出于不忍。这原是一切评论的动因，没有他人以为的那么复杂。

2013年4月

自序

就从书名谈起吧。

这本小书收入了历年所写的部分文章。文章初步编定后，曾不假思索地起了个书名：磨刀集，取自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——“十年磨刀：读书的困惑”。三月初的一个晚上，我和行远与陈冠中、于奇、张宁、徐淑卿诸位相聚，谈到这个书名，大家均表不满。张宁兄提出叫《不对》，富有图书出版经验的淑卿高度赞同，冠中、于奇夫妇更是提出以“不对先生”、“Mr. NO”作为封面语。几位的高见令我悦服，感激之情就不用说了。

的确，本书所收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直击、是观察还是忧思，其出发点都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职责，就是对所有的不对说“不对”。现象不对劲，制度不对头，官员言行不对头，还不许别人说不对，这样的社会还会好吗？当然，敢于说“不对”，绝非意味着我们的批评都是对的，也绝非意味着我们自己就没有什么不对。关键是要让大家明白，人都可能有不对，但是知道了就要说出来。

说“不对”看起来是一种否定，但是，对“不对”的否定不正是对“对”的肯定吗？当我们说“不对”的时候，心中不正是怀有关于“对”的价值观和理想吗？美国有一本给小学生读的《公民读本》说，如果看到国家在做不正确的事情而不吭声，甚至反而说做得好，这就是破坏的而不是建设的态度。这些都是关于“不对”的最简单的常识。可惜的是，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要为说出常识、实践常识而奋斗的时代。在这时代，做一个“不对”

先生，是尽公民的责任。

关于“磨刀”，还可以多说两句，虽然作为书名的确比不上“不对”那么好——它既没有直截了当地表明立场、态度，也难以使今天的青年读者在一瞥之中就把握住某种气息。大家觉得，它更多的是反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内心情结，是某种时代悲情的印记。

可以说，“磨刀”是一种心境。读了三、四十年的书，不断明白过来：读书如磨刀，读完书就要用，不是“砍柴”就是“杀人”。当然，读书的刀磨得再锋利，既砍不了柴也杀不了人。只能说，通过读书把柴薪砍来，在内心点燃，在内心向外在的不义和内在的懦弱举起大刀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磨刀”是“不对”的基础和前奏。

几十年一边读书、读报、读网，一边写作，就像边磨刀、边看地形看天气，好像总在内心等待什么、密谋着什么。我在文章里说，也曾有一些读书讲座上和青年学生交流，说有时候会突然冒出《红岩》里那个装疯的共产党人华子良喊出的接头暗号：“让我们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吧！”——读书与写作好像也是一样，是为了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。那个“伟大的日子”是什么？对有些人这个问题或许根本不存在，在我却似乎是无法摆脱。看艾晓明、胡杰拍摄的纪录片《中原纪事》，片中的高耀洁老人在家里包书、去邮局寄书，难道她不是在内心憧憬着一个“伟大的日子”么？崔卫平翻译《哈维尔文集》，难道不是为了迎接那个“伟大的日子”而给思想者锻造批判的武器么？

其实，所谓的“伟大的日子”就是自由交流的日子、每一个人都拥有人的尊严的日子。读书和写作不就是为这些日子而准备的么？如果有人说只有“精英”的读书才会这样想，那真是大错特错了。别的不说，我周边不少痴迷读书、关心写作的朋友都不是所谓的“精英”阶层，他们心中所念、口中所言，尤其是对书的选择，没有一样不是与那个“伟大的日子”密切相关。古人说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有良知的读书人怎能无动于衷？在这个意义上说，读书人不就是磨刀人么？

书要不断读，刀要不断磨，磨完要有行动。

发出“不对”的声音，就是一种行动。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，说的人多

了，慢慢就有力量，就有希望改变“不对”。

集中所收文章基本上都是2000年以后所写，只有两篇是写于80年代。《公鸡的使命》产生于当年的一场讨论，80年代初期深圳的思想氛围是何等的活跃与尖锐。像“改革者的使命”、时机和道德勇气这样的问题，在今天不仍然是令人关注的吗？《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》中说到：“假如我们真的把一切高贵的理想精神和热情都丧失殆尽，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所曾付出过的沉重代价将是真正的白白付出了。”现在似乎已经进入了“七七级”主政的时代，同时也是“七七级”逐渐淡出舞台的时代，关于理想、热情和代价的话题是否还能对当年的同学有点触动？

毫无疑问，知青岁月、“七七级”大学生涯和80年代中国的热血悲歌，是我个人精神成长的基本底色，是一直说“不对”的精神源泉。唐朝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，与人言多询时务，读书史多求理道，“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“时”与“事”，的确就是写这些文章的因由。其中有些文章曾在网络上流传较广，也引来过叫骂之声，如《有一种计算方法叫无耻》、《“十月革命”的硝烟与历史真相》、《信息自由是反击诬蔑最有力武器》等文。有些文章因时因事而起，但是或因为专栏的性质，或因为其他原因，这些“时”与“事”并未直接论述，而是在谈书论史中强烈地寄寓着对它们的思考。这类文章尤见于第二辑“愤怒书斋”，如《“惩罚……抬高了我们的身份”》、《“我的勋爵，你处罚了一个……无辜的人”》、《从来无需捍卫……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记忆》等。

第五辑“直击广州”收入多年来在广州媒体上发表的部分时评文章，所谈的都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、社会事件、官员言行等问题，都是对具体个案的“不对”之议。多年来，除了写这些报纸时评，我还在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、新闻频道等持续地做时评节目。今天重读那些数以百计的文章、文稿，许多与广州市民一起经历的事件、所纠结的议题历历在目，回响在这些文字中的声音正可以浓缩为“不对”两个字。这些文章或许也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广州“公民现象”的某些特征：媒体对民意的积极关注与反映，公共决策出台前后的官民博弈，事件中不断推进的民意觉醒，以及言论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的允许讨论。这些在当今中国新闻媒体中仍然不是可以轻易实

现的。

还应该说的是，由于具体公共事务、公共决策往往涉及到许多专业性问题，在说“不对”的时候绝非自以为对所有问题都有知识、所提的批评都很对。之所以还敢说“不对”，是因为：第一，许多公共决策的出台都有着共同的过程特征，如信息不公开、程序不正义、论证走过场、监督不落实等等；而在其背后又有着共同的实质特征，如利益主体的隐匿、官商交往的黑幕、公共利益的受损等等。所有这些都不是技术性的问题，而是公共政治的常识问题，因而可以、而且必须从常识出发说“不对”。第二，提出质疑、追问真相、要求信息公开，这是所有“不对”之声的核心，而这些声音很难期待那些既有利益关系、也深知内幕的真正专家、技术官员主动发出来。所有质疑，只能从外部追问进去。第三，所有的“不对”主要都是讲常识、讲逻辑、讲疑问，这实际上就是公民自我教育的过程，是全社会逐步形成公民意识的过程。

应该再重复前面那句话：在这时代，做一个“不对”先生，是尽公民的责任。

最后，必须对朋友们和我的家人表达无尽感激之情。在这时代，有一种朋友是思想的交流者、道德勇气的激励者，是阴霾天空下的光与温暖的传播者。在这时代，能有这样的朋友和家人是一生中的幸福。

感谢广州、上海等地众多媒体朋友多年的关爱与支持，尤其是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新快报》评论专版诸位编辑和主持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的陆灏兄，才有了这些“不对”之文。南方日报出版社刘志一先生主动约稿成书，于谈文论世中凸显出版人的思想识见。文道兄慨然赐序，所谈“不忍”之义，深获我心，受益良多。冠中、苏里、晓渔三位的激情赐语，更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。邝飏先生为本书设计封面并专门创作了多幅插图，以图像的力量为“不对”增色，这是图文时代的思想战壕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4月25日

目录

序言 不忍而已 / 1

自序 / 4

第一辑 时评纵论：丧钟为谁而鸣？ / 1

公鸡的使命 / 2

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/ 4

警惕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的政绩工程 / 6

孙志刚四周年祭 / 9

纪念王小波，如何争做自由人 / 13

超越分歧的历史记忆与自由价值 / 15

有一种计算方法叫无耻 / 18

“十月革命”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/ 20

信息自由是反击诬蔑最有力武器 / 23

迈向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途径 / 25

让法制建设在救援与重建中不断完善 / 28

生命中必须承受之痛 / 30

需要耐心阅读和倾听的索尔仁尼琴 / 36

让维基解密在……飞 / 39

道殇：丧钟为谁而鸣？ / 42

放权诚可贵，民意价更高 / 45

什么是“两会”的“敏感问题”与“个人意见”？ / 48

第二辑 愤怒书斋：十年磨刀 / 51

进行着的世界史 / 52

学者与政治权势 / 55

十年磨刀：读书的困惑 / 60

结社，还是不结社，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/ 63

30年阅读记忆 / 66

“惩罚……抬高了我们的身份” / 70

宪法与诗歌是……最后的底线 / 74

“我们在，因为……我们在斗争” / 78

权力观的颠覆：历史叙事中的非暴力运动 / 82

“我的勋爵，你处罚了一个……无辜的人” / 85

是“革命将至”还是……“现在就革命”？ / 89

从来无需捍卫……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记忆 / 93

仍需文章觉天下，只缘霸业……苦苍生 / 97

“宪法是……拿来用的” / 101

第三辑 教育忧思：蔡元培魂兮难归 / 105

大学校园的道德与政治向往 / 106

婢女是怎样炼成的？ / 109

学位诚可贵 生命价更高 / 112

大学是知识与思想启蒙的摇篮 / 115

高校为何欠债？应该谁买单？ / 122

清华百年又如何？ / 124

蔡元培魂兮归来又如何？ / 126

第四辑 文艺观察：寻找自由的天空 / 129

当代艺术与社会公正 / 130

艳阳金光真或伪，兼问苍生与鬼神 / 137

图像与政治（五则） / 140

流放者的归来 / 147

廖冰兄的良知与勇气 / 150

向吴冠中说真话 / 152

虐囚与酷刑：来自古拉格的图画 / 156

艺术名利场中的权力、资本与制度性腐败 / 161

第五辑 直击广州：为公民现象而鼓掌 / 167

来一次大张旗鼓的访贫问苦 / 168

广州人，你们可要警惕啊！ / 170

广州发展“规划”是怎样炼成的？ / 172

同德围之困：文明广州的耻辱 / 175

弘扬地方文化的方言平台不应萎缩 / 177

万市长，你在哪里？ / 179

千呼万唤不回应，莫非真的有腐败？ / 181

城投集团的来头背后隐藏着什么？ / 183

在户籍壁垒与业绩壁垒的双重夹击下 / 185

为广州公民现象而鼓掌、鼓劲 / 188

海心沙项目与广州公共决策的耻辱 / 192

公共话题的“烂尾”是对民意的罔顾与蔑视 / 195

“城市文化名片”与浮躁政绩 / 197

白云山隧道工程有违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/ 199

广州大学城的发展不能违背办教育的根本宗旨 / 201

纳税人要盯紧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 / 203

第一辑
时评纵论：丧钟为谁而鸣？



公鸡的使命

《现代人报》第32期的社论《公鸡效应》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：公鸡应该什么时候才叫？该文认为，半夜鸡叫难逃劫运，日中打鸣也必遭人白眼，因而，公鸡应该在太阳将要升起和人将要醒来之时引颈高吭。作者的立意无疑是好的：改革家应该审时度势，选择最佳的时间和方式输出创造性信息。

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作者把这种“公鸡效应”奉为现代改革家的行为准则，这就令人不敢苟同了。

质疑之一：“太阳不是公鸡叫出来的，叫不叫天都会亮”，不错，这是常识。但以此比之于社会政治，却又显得有点缺乏常识了。谁都知道，大凡真正的社会变革，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到钟到点便从天而降的，而总要经历一番酝酿、阵痛与催生的痛苦进程。正如作者文中说的，“社会改革的大趋势是由社会自身的多方面原因促成的”，难道在这“多方面的原因”中可以排除思想的启蒙、舆论的先声么？窃以为“公鸡或改革者们，首先要清醒地认识”的，恰是天不会自动就亮的，公鸡们如果不叫、不喊，不吵掉人们的迷梦、噩梦，太阳是不会自动跑出来的。假如真的按作者文中说的，“叫不叫天都会亮”，那人类社会的进步岂不成了太容易的事情了吗？可惜阅尽春秋，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如此便宜的先例。

质疑之二：“人就不是一定靠公鸡啼鸣才醒的，即使没有鸡鸣，人也会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”，这也不错，也是常识，可比之于社会的人，则又错了。人民是什么？恩格斯说过，人民只是听到雷声便相信是雷神在打鼓的一群。鲁迅终其一生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麻木、丑陋。鲁迅先生还极深刻地

把中国人的历史捅了个大天窗：一部历史，无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历史。在这里，人的真正解放自己的生物钟哪里去了？一个社会，尤其是在封建专制笼罩很紧的社会，其造成的最锐利、最揪心的痛苦，往往只有极少最敏感的优秀分子才感受得到。假如他们甘于沉默，寄希望于每个人“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”，那可真是这专制社会的齐天洪福了。

质疑之三：作者说，勇士们“虽可歌可泣，是思想先驱，但不是对社会起实际变革作用的改革家”，好一个“实际作用”！试问，思想家，尤其是“思想先驱”的价值和意义能以实际作用去衡量、去论定吗？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，到鲁迅，他们在其所处的社会中具体地改变了什么、确立了什么从而显示出他们的“实际作用”呢？没有实际作用，就仅有悲剧的、令后人歌且泣的审美价值么？可以设想，没有在“文革”中逐步觉醒而呐喊的勇士，没有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声浪——那都不是在太阳就要升起的美好时刻——“四人帮”会一下就倒台、改革之风会一下从太平洋刮来？是的，勇士们（过早敢于叫将起来的公鸡们）的实际作用是难以列举的。

质疑之四：作为思想者、改革家，固然不应只追求为改革献身的道德价值——关于这一点，笔者是颇引以为同调的——但是，难道只有在胜利在即、必操胜券、无厄运之虞的时候，才是改革者值得“引颈高吭”的时辰么？是，打死老虎，然后披红挂绿地得胜回朝，谁个不争先、谁不逞英豪？这不有点辱杀了“现代人”、“改革者”的美名了么？“办实事，办成事，而且经济、高效、损失最少”，这可以是商人的价值判断标准，因为商人为自身谋利乃是天经地义。但真正的思想者、改革家，难道不是首先唯真理、唯正义是图吗？当然，为力求生存而进行的战斗必须有策略意识是重要的，但战斗与生存，何者为首却是原则问题，否则“公鸡效应”便不折不扣地沦为与庸俗腐败现象和平共处的活命哲学了。

自然，黎明总会到来。但等待戈多实际上只能使戈多永不露面。所有的真公鸡都应该叫，就在他感到如鲠在喉，不叫不快的时候叫好了！若真如此，黎明能在哪个黑山洞里藏多久呢？

1986年10月

（原载《深圳青年报》1986年11月7日）

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

××：

来信谈到了“这一代”——你主要指的是七七、七八级大学生——在今天的境况如何、风貌怎样的问题。这实在是一个很诱人的话题。作为“这一代”中的一员，我可以给你谈一点感想。当然，世事嬗替不居，而人的感觉往往又是很偏执的。知我罪我，悉由尊便。

当年，在一场空前惨烈的文化劫难之后，迎接我们的实在是一片荒芜的校园。四年的时光，不少人冉冉然抽成了一根会思想的芦苇，恐怕全是自己修炼的结果。大学校园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伏案的战场，不如说是反思的长廊。在这里我们的初衷和远志得到确立：我们必须同时是社会良心与文化精英，才不至于辱没了“知识分子”这个称号。那时节真正是一个精神的上升期。

1982年我们毕业了。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七彩纷呈。一时间留学、经商、从政成了最合时宜的话题，社会似乎慷慨地偿还对这一代人的欠债。然而，谁敢肯定这就是历史之神对这一代人的真正厚爱？在价值理想与现实功利的严酷冲突面前，望风披靡地倒向后者成了天下大势，各种欲望像洪教头放走的魔鬼，再也无法收回。说实在的吧，在今天的许多同学中间，表面上的升降荣辱已经成了横亘在人们心上的一根无形的价值杠杆。

诗人北岛说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。当然，我们身后的墓志铭未必那么高尚，而我们目前所持握的通行证也未必就是卑鄙——然而，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。